一颗沉静的心

党员风采

人物简介

周先波：安徽肥东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1999 年 7 月于中山大学基础数学专业博士毕业。2007 年 6 月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毕业；2011 年度，获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奖之杰出科研贡献一等奖；2012 年获评为中山大学优秀党员。



采写/本报记者 彭敏哲

翻开周先波老师的履历，不由得吃了一惊：周老师是罕见的数学和经济学的双料博士。好奇地询问，原来这背后还有一段十分曲折不凡的经历呢。

数学+经济学=?

周先波从初中起就对数学特别感兴趣，1983 年高考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数学专业。1996 年，周先波考入了中山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从此与中大结缘。90 年代末期，数学与经济学结合日渐成为学科发展趋势。1998 年，岭南学院开办本科生“数学-经济学”双学位班，培养具有良好数学能力的经济学人才，迫切需要引进数学教师。就这样，1999 年毕业的周先波，成为岭南学院引进的第一位数学博士，不久走上了数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问学之路。

起先，周老师发现单单有数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学会运用数学知识对实际问题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用经济学理论作出解释，是经济学专业学子的重要培养目标之一。周老师觉得这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储备提出了新要求。于是他开始旁听学院的一些经济学课程，同时，也开展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2000 年初，国内著名大学的经济学院根据经济学科的发展规律与最新动向，纷纷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育人模式，确立培养探索性创新型人才，重点突出数学学科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周老师觉得有必要进行系统的经济学学习，并利用数学优势提升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水平。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2002 年周老师经过面试并通过 TOEFL 考试，于 2003 年春获得进入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港科大，博士生的课是从高宏、高微、高计开始上的，这些课都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这方面我有一定优势，但经济学最基础的知识还需要自己去补，去旁听经济学课程。具有挑战性的是，前两年进行淘汰制考试。一开始，很不适应，一是很久没有进行如此高强度的考试了，二是当时年龄也大了。但我相信：坚持就是胜利。淘汰制逼着你刻苦学习，坚持下来的人，都感到收获非常大。”科大看似“残酷”的学习制度让周先波迅速实现了从数学到经济学的跨越，这一段脱胎换骨的经历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有幸跟随科大陈松年教授攻读计量经济学博士，很佩服他坚实的数学基础和敏锐的统计直觉，陈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令我感觉收获很大。”

要问数学+经济学=？周老师说：“数学可以为经济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工具，良好的数学基础是学好计量经济学的必备要素。”有了数学作为钥匙，就不怕打不开经济学这扇看似坚固的大门。

"简单结果的背后"

■ “计量经济学博士要敢于啃硬骨头”

经济学中，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估计和检验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研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上，周老师主要着眼于“非线性微观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方法”的前沿研究领域，对 Tobit 模型的非参数和半参数估计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选择计量经济学作为研究领域，当时觉得，一方面我有较好的数学基础，另一方面国内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前景良好，还有就是，中大当时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很缺师资人员，因而我希望学成回来可以更好地从事教学和科研。”

约莫 80 年代末至 2000 年，与非线性微观计量模型(包括 Tobit 模型)相结合的半参数估计研究成为了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前沿领域，计量经济学家寻求非线性微观计量模型在约束尽量少的条件下的一致性估计，并使估计量有足够好的小样本表现。此类模型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等领域。“但在我攻读计量经济学博士生期间，导师要求其时只可研究计量经济的理论和方法。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模型识别、估计量构造、大样本性质证明、小样本表现模拟等，相当艰苦，且研究周期长，有可能长期没有进展。为此我也曾产生过动摇，由一些数据应用模型的已有估计方法做些实证应用不是更容易出成果吗？但导师的指导和执着使我很快放弃了那种想法——计量经济学博士要敢于啃硬骨头。经过四年半的潜心努力，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于 2007 年 6 月毕业。”周老师微笑着回忆。

此后周先波先后进入香港城市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及美麻省理工学院访学研究。2010 年 12 月，周先波成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获聘为教授。

“我的经历说明虽然最初所学的专业未必是你日后要从事的，但做好眼前的事更重要。”

■ “坚持，坚持下去十分重要”

2011 年到 2012 年，周先波教授的两篇论文《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a Bivariate Tobit Model》和《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a Truncated Regression Model》在国际著名计量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上发表，让国内同行十分惊羡讶异。这份殊荣令周老师自豪不已：“在 JOE 上发一篇文章周期长，难度大，需要真正的厚积薄发。多年的潜心研究有了结果，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

灼灼风华的背后，饱藏着万千辛苦的孜孜跋涉。周先波说，“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对估计量有限样本表现的模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手段。也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一个简单的比较研究结果，背后可能是相当繁琐枯燥的数学推导和模拟编程过程。当由直觉或理论推导得出一个估计量的构造是合理的，但模拟结果却出乎所料，没有反映出这种合理性时，进一步的探索和坚持十分重要：是程序出了问题呢，还是直觉和理论推导出了问题呢？可能之前的所有功夫都白费了，一切需要推倒重来。这时，坚持成为研究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不能轻言放弃。”周老师如是说。

近年来，岭南学院教师的论文在国际权威期刊上逐渐崭露头角，学院学术成果逐步跻身国际学术圈，学院国际化进程亦稳步推进。“能为学院的学术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我感到无比欣慰。”

“学生的事最大”

走进周老师的课堂，那仿佛是散着幽幽茶香的温馨小家。“周老师上课很平实，他总是带着微笑，特别和蔼亲切。他的课堂总让人很有收获。”学生这样说。

一位学生上课迟到了，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室，周老师温和地说：“上午没课吧，怎么来得这么晚呢？”一份责怪，却带着三分关切。平实的课堂，却有着回味尤甘的内蕴。课前课后，周老师的讲台旁总是围满了求知若渴的学生。有一次，一位同学想提问，恰好上课铃响了。等下了课，没想到周老师主动走过来问他，“刚刚没有问完的是什么？可以继续说了。”

“学生的事最大，我首先做好教学，把教学的事做好了再做科研。”简简单单一句，在旁人看来再平实不过，却蕴含着他投入其中的巨大心血。

其实，不论是从数学转经济学也好，还是在学术上不断进取也罢，他都是为了一个中心服务——更好地教好学生，做好一个教师的本职工作。在岭南学院，周老师给研究生开设高级计量经济学两门课程 (时间序列分析和非参数估计)，还开过《高级微观经济学》，同时，还给本科生开设《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班《实变函数》两门课。在同学们眼中，周老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良师益友。每当实验项目学生们申请导师时，周老师的名字总是特别“火爆”。“周老师经常和我们聊天，问我们对课程的掌握情况，解答我们的疑难。”

2008 年，周先波老师参与的《多层次定位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体系建设》课题获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0 年 2 月，该课题荣获广东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0 年 5 月，周老师所授《计量经济学》课程获 2009 年度本科生网上课堂评教优秀课程奖“英文授课优秀奖”，充分反映了学子们对于周老师的认可和喜爱。

没有激情四射的演讲，没有壮志豪迈的抒情，但却有着如沐春风的温和儒雅，这就是属于周先波老师的独特课堂。

一颗沉静的心

2012 年，周先波老师获得“中山大学优秀党员”的荣誉称号，谈到这个，他谦虚地说：“我只是尽力把自己份内的事情做好而已。”

多年埋头学术与教学，曾经兴趣广泛、热爱运动的周老师笑称自己已习惯了“两点一线”(从家到学院)的生活。如今他最喜欢的事，就是每年和同事们集体出游，这期间不仅可以放松心情、欣赏自然，更重要的是能与其他老师交流心得、探讨学术，往往能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灵感与体悟。他最期盼的事，就是某天闲下心来与好友静坐对弈，体验黑白世界的乐趣。白云初晴，人淡如菊，并不波澜的生活，正映合着周先波温静和蔼的性情，一颗专注于教学科研的沉静的心。

采访接近尾声时，一位学生来访，看到学生进来，周老师先是起身，然后热情地招呼她坐下，那份亲切和熟稔宛如父亲的关怀。这平淡的一瞬，正是周老师平日里的生活缩影。让我们感受到他对青年学生的拳拳关切，及淡然的外表下掩藏的一颗火热的心。

学者也好，党员也罢，周老师真正在意的，并非这些荣誉或头衔，而是这些荣誉承载的重量，这些头衔背后的责任。或许，这就是一名优秀党员、优秀教师的内蕴所在吧。

世纪之念

了圆满的休止符……伯尔诺阿祖孙三代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划上越近一个世纪，在中山大学、中大附属一院和一段旷世持久，一波三折的中德情缘，跨

采写/贾茗涵 李绍斌

2012 年初，黎孟枫副校长突然接到一个来电，电话那头，中大环境政治科段一斌教授激动地说：“黎副校长，您还记得附属一院的德籍院长吗？他的孙子总算托我找到你们了！”黎副校长急忙将消息转达给附属一院党委书记颜楚荣。德籍院长？柏尔诺阿？颜书记既意外又惊喜，要知道，附属一院百年历史上仅有两位外籍院长啊！而柏尔诺阿院长是于 1928 年来到中国，因二战爆发于 1948 年返德，至今已是六十多载，中间鲜有消息。老院长在时的附属一院是何情景？他回国后过得好不好？他的后代是否还记得这块布满童年印记的故地？来不及想更多，颜书记立即安排接待柏尔诺阿院长后裔的事宜。

1927–1937 年：“全盘德国化”

如今就连许多附属一院的医生，都不知医院发展史上曾有过一位德籍院长，更不知附属一院与德国曾有如此深的渊源。据载，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曾说：“民国十五年（1926），张静江先生特别对于医科，主张根本建设，他以为现在世界上医学最进步最发达的就是德国”——张静江认为“医学学术的建设必须有标准”，所以“主张全学德国”。

1927 到 1937 年的十年，是从前附属一院(彼时名为广东公医学堂附设医院）及医学院(即广东公医学堂)发展最兴旺的时期，当时医院很多医生同时兼任学堂的教授。其显著特色就是全盘德国化——“教师请德国的，学制仿照德国的，各种制度设备、课程的编订和外国语，都是以德国的做标准”，就连医院查房、写病历、开处方、甚至入学考试，均使用德语。

这十年中，医院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南中国首屈一指的西式医院，一个重要的举措是：1927 年，医院聘请了七位德国学者，其中便有内科学教授兼医生伯尔诺阿博士(Dr. Bernauer)。他们常年任教于学堂并兼任医院的各科主任，给彼时的附属一院留下了深深的德国烙印，也完全与之前达·保罗(美籍)任院长时的美式传统区分开来。德国教授们潜心专业，工作认真，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成为后来者的楷模。

事实上，据资料载时任医院妇产科主任的德国人傅韦尔教授描述，当时华南一带，一般的居民尚未普遍信任西医。实际操作中需要医生耐心对病人讲解，才能“克服民间一般之偏见及诸陈旧之观念”。他亦提到，当时德国医生在中国行医的价值，除了体现在临床上获得良好的成就，及相应的地位荣誉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医学上的协助推动德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由此可见，当时医学在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中，还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

此间还有个插曲：1926 年，北京协和医院误把梁启超的肾切错了，此事反响巨大，很多人因此反对西医。但梁是个很开明的人，他深知自己的影响力巨大，如果因此事阻碍及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恐有损于象征着科学和文明的西医及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便亲自撰文为协和开脱。所以至今在协和的专家纪念墙上，唯独梁不是学医的。

而伯尔诺阿教授，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启了他在中国行医的篇章。

1928–1938 年：德国院长的辉煌十年

1928 至 1938 年，医院逐渐脱离了起初的草创艰难(创办于 1910 年)，步入了其发展辉煌时期，此间掌门人正是伯尔诺阿教授。伯尔诺阿主持临床内科教学长达十年，每周二、四、六上午授课，结合示教病例，详细解释，至学生听懂为止。他既有老牌德日系医学教育培养出的扎实基础和精湛医术，又有老派欧式绅士的风范与和善，拥有非常独特的个人魅力。

1928 年春至夏，及 1933 年 7 月至次年 7 月，伯尔诺阿教授曾先后两次担任医院院长，均不辱使命。他以及接任的翁之龙博士在任期间，竭力规划，并得到国立中山大学戴季陶校长的赞助，使得医院设备日臻完美，同事间精诚合作，院务蒸蒸日上。往来病人数量及收入，比以前骤增数倍。医院此时实行分科诊治病人制度，共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皮肤花柳科、眼耳鼻喉科六科。各科聘主任医生 1 人，助教医生两三人。凡病人来院就诊，都由各科主任诊治。此时医院的病房，也都以各科别划分，例如内科部限住内科病人，外科部限住外科病人，以此类推，这些如今看来虽平常不过，在当时却是十分领先的。

生活方面，伯尔诺阿教授一家在当时是十分优越的。其子回忆，他家的别墅坐落在沙面(当时的英法租界)，一家五口，家境相当丰裕。那时的中国人仍着旧式长衫，而他们一家习惯西装革履，典型的西式装扮，走到哪里都十分醒目。

伯尔诺阿教授十分平易近人，从不因自己的国籍和身份居高临下，与普通的街坊乡邻亦相处融洽。翻看当年的相片，有一张是一个挑着卷心菜的中国老农，让人好奇。原来老农是其邻居，常邀伯尔诺阿一家到他家吃饭，并时常给他们送来新鲜蔬菜。那时医院的实习医生可以给病人免费看病，约 70%的病人通过这种途径得到免费治疗，其余的 30%选择付费给教授看病。当时老农一家经由伯尔诺阿教授介绍得以免费治疗，心里十分感激，便挑着两担新鲜的蔬菜给他家送去，这一幕恰巧被拍了下来。

1938–1964 年：抱负无着空余恨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1938 年，日军大规模轰炸广州市区，随着广州失守，医院和医学院被迫仓促迁离广州，而伯尔诺阿教授一家也被迫返回德国。回到祖国他们才发现，陷入二战的德国境况更糟，混乱不已。

国家动荡，人民飘零。伯尔诺阿教授后曾到一个小诊所就职。过了不久，他被当局派往波兰当军医，之后又去了俄国等地，直至战争结束。

1945 年德国战败后，他渴望再回到中国，当时的中国也确实需要德国专家的支持。然而耗时持久的战争摧毁巨大，整个世界处于彻底的瘫痪和极其缓慢的修复中，民政等办证机构早已不复存在，不能正常办理入境证件，如若擅自入境，叛国、间谍的罪名随时可能找上门来，种种因素，伯尔诺阿教授的心愿最终没能达成。其子叙述，生活的沧桑巨变，加上年岁渐衰，伯尔诺阿教授的后半生沉浸在无尽的怀旧伤感中，哀伤不可排遣。

1964 年，带着深深的遗憾，伯尔诺阿博士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2012 年：后裔寻根，泪洒故园

从伯尔诺阿离开中国的那一刻起，他们一家的故事便戛然而止，再无消息。直至 2012 年初，如开头所述，他的孙子历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附属一院。其实，在之前的 70 多年里，伯尔诺阿教授的儿子一直都想回中国看看，毕竟这是他的童年生长地。15 年前，伯尔诺阿教授的孙子在香港开会，趁隙乘火车来到广州，有近五个小时的停留时间，他试图联系附属一院，可因语言不通等因素，最终抱憾而归。

伯尔诺阿教授的孙子是环境保护学专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获知中大环境政治科段一斌教授的联系方式，于是立即写信，多亏了段教授的热情连线，总算促成了父子俩的这次寻根之旅。

一切安排就绪后，2012 年 4 月，伯尔诺阿教授的儿子再次踏上了广州这片故土。此时的他已是白发苍苍，来之前刚换了两个人工髋关节，心脏不好，还因胃癌做过手术，可以说老人家纯粹是靠意志撑到了中国。这是多么饱含深情的一份故园情结！



1928 年伯尔诺阿(前排左五)与教职工合影

老人家说，他六岁之前只会讲粤语，都是跟保姆或者当地小孩学的。六岁以后，家人要求他学些德语。这么多年过去，他依然会偶尔蹦出一两个粤语词，从 1 到 10 也能流利地用粤语数出来。有意思的是，当颜书记唱起一句广东童谣时，他竟然马上就能接下来全首，引得在场的人会心大笑。

重游医学堂(即北校区)时，每一个曾经熟悉的场景都引得他驻足逗留，时而给随行的人们讲起当年的故事，更多的时候静静停留，闭眼回想，老泪纵横。他发现中山医学院行政办公楼前多了个孙中山铜像，走到办公楼旁边的三幢小楼(老干活动中心、保健科、武装部)时，他突然兴奋地说，“小时候我还在墙上刻了我的名字，我要看下它还在不在！”说着就像个孩子似的找起来。随行人员再三解释房子已经过多次装修，几十年前刻的东西应该不在了，这才打消了老人的念头。老人点头叹气间，眼泪在眼眶里无声地打转。走到附属一院当年的住院楼时，他说要上去看看，没有任何人引导，他竟能准确地指出父亲当年待过的办公室，手术室和隔离病房。

他还主动提出要去二沙岛——他们家的旧址看看。当年伯尔诺阿教授的儿子在二沙岛的一个医院出生，他拿出在新加坡买的广州地图指给大家看那个记忆中的地方，毕竟时隔太久且中间经过纷繁的战乱，再去二沙岛寻找时已经没有这个医院的任何记录了。他记得家门旁边的那座石桥，记得黄埔军校落成时亲眼见到过的周总理，记得如今沙面河上依然漂浮的他上学时曾划过的小船。

他甚至还保留了些根深蒂固的习惯：看粤剧，至今还常收看中国电影电视剧。他的儿子对他关怀备至，一路照顾得体贴入微，颜书记开玩笑说：“你们这种父子关系啊，有点像中国传统的孝道。”他点头微笑道：“真正的欧式传统里，老人和下一代都是比较剥离的，老人老了就送养老院，年轻人一般很少照顾他们。但是我们家跟普通欧洲人不一样。”颜书记紧接着问：“那是一种中国文化融入到你们骨子里面了么。”他说：“我们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你看，我儿子对我生活的照顾，就完全符合中国的孝道，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我们一家都有中国情结！”

余情未了，再续前缘

前面提到，伯尔诺阿教授的孙子是环境保护学方面的专家。目前，其孙已展开与中大环境学方面的相关合作，为的是接续前缘，继续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天若有灵，想必伯尔诺阿教授一定会倍感欣慰。

一段旷世持久，一波三折的中德情缘，跨越近一个世纪，在中山大学、附属一院和伯尔诺阿祖孙三代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划上了圆满的休止符。传奇的世纪之念，因其深情厚意、跌宕起伏而隽永流芳。一念缘起，万念缘生，无数后人接续的中德友谊，远远没有结束……

党员之声：

■为实现共产党人的承诺，我执着地实践着自己的座右铭：“服务社会，心底无私天地宽，不用扬鞭自奋蹄”。坚信人生在世“成事在于理而不在势”的理念。

■为中华伟大复兴，厚优秀文化底蕴，载中华科教英才。

——中山大学原校长曾汉民教授

从李康、郭清顺教授的“餐桌妙论”谈起

文/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王竹立

一次研究生答辩，广州大学的李康教授来做答辩主席。中午吃饭时，李康教授说他曾就吃饭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写过一篇博文，大意是：有两种做菜的方法，一种是西式的，例如肯德基那样，先选好各种配料，然后按照标准程序、规定时间加热即可。这种方法，无论在哪里，做出的口味都是一样。这相当于我们按照教学系统设计模式一步一步设计教学方案，对学生进行标准化的培养和教育。另一种就是中国式的，没有固定标准和程序，什么都是模糊的，例如：盐少许、葱几根、味精若干，到底放多少，要凭个人经验，而且因时因地而变。用这种方法每个人做出来的菜味道都不一样，水平差异很大。就好比我们古代的师傅带徒弟，要因材施教。他质疑，显然用标准方案做菜的厨师比较容易培养，但你听说过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师吗？

郭清顺研究员向来喜欢用吃饭做菜打比方，闻听此言，立即接过话头。他的意见是：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培养人才固然很好，但毕竟出人才的速度太慢；现代社会需要各种具有专业素养的人才，而不是人人都要按大师来培养，所以肯德基式的培养方式还是必要的，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这种把两个相互矛盾的事物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一种二元化观点，现在我们要提倡和谐，将彼此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这大概是一种三元观点吧。

以上李、郭两位教授的意见我只是凭记忆述其大概，当时我因为有事急于离开，未及答话。只是走在路上时细细回味他俩的高论，觉得虽各有妙处，但也有不十分贴切的地方。例如做菜可以按标准程序来，做出来的味道可以保证几乎完全一样；但培养人即使全部采用标准化流程，出来的人也仍然会差异很大。肯德基为了做出味道一样的食品，其材料是经过特殊挑选的，往往要求来自同一个地方，按照同一个标准生产；但培养人就不能这样，我们不可能事先挑选我们的培养对象，要求他们各方面都完全一致；何况人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个性，这是与“物”最不同的地方，怎么能按同一个标准来培养？又怎能指望培养出来的人都完全一样？

其次，在工业化时代，班级授课制度把人才当做标准化“产品”来大规模生产，也许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但今天已是信息化时代、创新时代，所以教育也需要及时更新，采用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培养方式，才能培养出新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

我自己曾有过这样的体会，当年我初次接触教学设计时，也很笃信那些教学设计理论与模式，曾严格按照某个过程模式，一步一步设计教学方案，甚至连一堂课每 5 分钟做什么都事先设计好了。然而我发现按照这样的教学设计方案进行教学效果并不好。开始时也许还新鲜，但久而久之就会变得枯燥乏味。

再好的方案也不能一用到底，中间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变化。因为人都是喜新厌旧的。现在我很少再做过于细致的方案设计了，只掌握一些基本原则就行，具体的教学方案往往要最后一刻才能定。而且我还刻意求新求异，以保持教学的新鲜感。我相信岳飞在排兵布阵时说过的一句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